

NÜBINGLIEZHUAN

女兵列傳

封面题字：李一氓
责任编辑：吴金海
封面设计：于文盛
油画作者：宋韧 肖峰

女 兵 列 传

第 三 集

菡 子 主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插页 7 字数 482,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10078·8875 定价：4.15元

目 录

序言·····	傅 钟(1.)
康克清——红军里的女司令·····	毕 方(1)
红军女杰张琴秋·····	钱 青(13)
历史的见证人	
——记刘群先·····	宁漠·韦尔斯(37)
非凡的战士	
——记危拱之·····	曾 克(64)
中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	陈弘毅(85)
一个老红军女战士的回忆·····	王泉媛(96)
钱希均——杰出的红军宣传员·····	刘敬怀 毛树成(116)
我的战斗生涯·····	谢 飞(130)
女红军“定国公”·····	卢 弘(143)
红军女连长——郭长春·····	志 文 金 晖(161)
征程中的铁人	
——记陈罗英·····	胡涤非(187)
三过草地·····	庞济轻(191)
“金莲”万里行·····	徐中立(202)
由孤儿到红军战士·····	林 江(223)
·张明秀——坚决走红军的路·····	赵兰英(234)

史群英——在长征路上成长……………葛象贤(245)

一位可敬的大姐

——记钱英……………刘克境(256)

什么也不怕的人

——记陈少敏……………于凭(261)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陈修良(274)

革命的“三剑客”

——记夏之栩、陶桓馥、葛琴……………阮波(293)

追求理想和光明的战士

——记彭镜秋……………保冬妮(297)

中州女杰

——记樊西曼……………董铁志 郭基康(312)

青少年时代……………王仪(320)

往事灼灼……………王于耕(336)

忆张茜……………林果(357)

她的心中只有伤员

——记蒋南屏……………张永(377)

女兵生涯的断想……………郝治平(395)

冤花果

——记肖哲……………志文 金晖(426)

铁栏寒窗……………严昭(438)

坚持皖南斗争的十年……………洪琪(450)

东进序曲中的一个女兵……………郑少仪(465)

从洋学生到土八路……………张鸿志(475)

归侨女杰欧巾雄……………张良生(488)

虎口余生……………郑里明(493)

一颗永放光彩的“赤色明星”

——记李伯钊……………卢弘(506)

悼关露……………锡金(522)

特殊的使命

——关露、佐滕俊子与《女声》……………萧阳(533)

在革命的洪流中……………玉华(543)

青春的足迹……………孙璋(568)

战地摄影记者……………陈菁(587)

女囚……………朱微明(599)

温故知新……………苏茹(610)

日本女八路……………西虹 王之琪(625)

女英烈张溪兜……………蒋伯英(653)

编后记……………(660)

康克清——红军里的女司令

毕 方

那一年我想采访康克清同志时，适逢她身体欠佳，可这位可亲可敬的大姐还是接见了，并向我谈了她的童年以及她在长征中的一些经历。她回忆说：

“我是江西万安人，从小住在赣江边上，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记得每天天刚蒙蒙亮，奶奶就挥着个破成两半、下边劈成杈的竹筒，把鸡呀、猪呀往屋外面轰！一听到竹筒敲在地上哗哗响的声音，我就赶忙跳下床，牵着家里唯一的老水牛上山去。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个子还没水牛高哩！”

“除了放牛，我还捎带着拾柴，捡蘑菇。常常提着篮子，腰里的围兜都装得满满的，‘该吃饭了！’奶奶朝山上喊两声，我这才牵着牛汗水淋淋地回家来。捡回的柴禾堆在门旮旯里，过不多久，就攒成一个大堆，奶奶高兴了，也夸我几句。”

“其实，这并不是生我的家。我的亲生父母，一年到头都在赣江里打鱼，或给人家放木排，吃了上顿愁下顿；我的五个姐妹从小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我也一样，出生四十天就给送到这边来了。本来也是当童养媳的，来后不久，这家的男孩死了，我又作了‘望郎媳’。用我们那儿的话说，就是要‘陪’第二个男孩。结果那家却添了个妹子，不久她也死了，我便成了他家的养女，

养父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桂秀。

“我的养父佃了人家几亩田耕种，他认得几个字，年轻时候喜好搞个茶灯，茶灯是我们家乡的一种民间戏曲。也许是他们演的内容触犯了官府吧，父亲曾经被抓去坐牢，家里只好把佃的田转佃出去。母亲到财主家帮工，好容易凑了一笔钱，才把父亲赎出来。从这以后，日子更难对付，为了躲债，爹妈十冬腊月不敢在家里呆。父亲还是丢不开他的茶灯，常年在外流浪。母亲成了全家的一根大梁，里里外外都仗她来操持。

“我十三岁上，烧饭、舂米、推磨、车水、下田，什么都干，全家人的鞋子也由我一手来做，真顶一个大人呢！村里人夸我懂事能干，家里人也拿我另眼看待，比起别的童养媳来，我受的待遇算是强多了，大家叫我‘媳妇王’。不过，家里对我管得还是很严的。父母一向教我不要占人家便宜，不许藏奸耍滑。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在地里干活，锄头把松了，要我拿回家去换一个。走到半路，我把锄头在石头上敲了一阵，以为安牢靠了，便懒得再回去，转回来交给父亲。他刚一挥锄，锄板差点飞下来打着人，气得他捡起牛鞭子就抽了我一鞭，痛得我身子打颤颤。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作那种不老实的事了。其实，全家人中，我最怕的还是奶奶。她虽然也喜欢我，但她固执、狭隘。我这人心软，看到别人有为难的地方，总想帮人一把。自己有点东西，也想分给别人，奶奶就讨厌我多管闲事。记得父亲从外乡回来，有时给我带回一封片糖（就是红糖片），我高兴得跟过年一样，总要拿到同伴们中，你一块，她一块，大家共享。奶奶知道了，就叨叨个没完。为我包脚的事，母亲和奶奶还狠闹过一场。奶奶一定要给我包脚，说是养个大脚妹子日后嫁不出去！我哭着不干。母亲自己就是大脚，她懂得大脚干活的好处，站在了我一边。她顶撞奶奶说：‘嫁不出去我养她一辈子！’这件事，

到底还是母亲和我胜利了！”

康大姐抬起她的脚，笑着对我说：

“我参加革命行军作战，走南闯北，还多亏这双大脚哩！”

康大姐颇有感慨地说：

“现在的年轻姑娘，恐怕很难体会旧社会劳动妇女的苦处啊！当年我的那些女伴，哪一个都有一肚子苦水。我们中间不少人是童养媳，当童养媳的，婆婆打，小姑子骂，有的饭都不给吃饱，有的婆婆用火钳烧红了往媳妇身上烙，有的脚板被打得一条条口子，红肉往外翻，不是童养媳的，也短不了有一天一顶轿子抬走，碰好碰歹，只好交给‘命’安排。媒人一进门，心里就象开锅的水，眼前呈现出个无底洞，落下去就是漆黑一片。那时候，大伙在一起经常叹息：难道我们命里注定，就这么一辈子受苦受罪？能不能有那么一天，世界变个样子？我们怎么也没想到，那天翻地覆的日子，果然到了眼前！”

仿佛又回到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康大姐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这期间，我们那一带闹革命了，一批读书人从南昌回到村里，四处找农民谈天。我第一次从他们那里听到世界上有个苏联，说是人家那里已经由工农当家作主，再不给地主当牛作马了！他们鼓动我们起来反封建，要求妇女解放，反对婆婆打媳妇、男人打老婆；反对包脚，说是妇女只有自己站出来反抗才有出路！说得我们心花怒放，大家私下里议论纷纷。我们还风言风语听说什么地方有个黄埔军校，校里招收女兵。年纪比我大的几个妇女，还商量要去当女兵。想想，我们这些穷山沟里的姑娘，一没文化，二没见过世面，到哪里去找收女兵的队伍呢？我的年纪比较小，她们商量这些事，我多半是在一边悄悄听，听着听着忍不住也插上几句。她们就吓唬我，

不准我往外说，还故意解释是说着玩的。我嘴里不吭声，心里却有了主意：别看 I 年纪小，到时候看我敢不敢跳出来！那些日子，真是连晚上作梦都想着这些事啊！

“村里越来越不平静，从省城和县里不断来人，成立了农民协会；以后又来了些妇女，说是要成立妇女会。我认识一个叫欧阳秀的同志，不知她什么时候把辫子剪了，出出进进忙得好带劲。她问我愿不愿帮她们招待一下来开会的人？我的心早就活了，哪有不愿意的，便一口答应下来，日夜往筹备会跑。代表们到了，就忙着给她们打水、烧茶。这些妇女，一个个跟男人一样，风里雨里，赤着脚，戴个斗笠，一身泥泥水水地从老远跑来开会，满嘴说的都是新事，实在使我羡慕。开会的时候，我也跟在一边听，越听心里越宽敞，好象打开了一扇大门。

“在这群人里，只我一个人还拖着条辫子，觉得很别扭，我就横了心，让她们几剪刀把它剪了。她们还发给我一顶八角帽。我戴上它，就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回到家里，养母一看脸都变了色，抓过一根棍子把我一顿好打。我哭也没哭一声，心里说，我本来就准备让你打的，辫子已经剪了，横竖你也安不上去了！母亲为这事还哭了一场，但也无可奈何，还是我胜利了。

“其实，父亲这时候已经是农民协会的主席，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但他脑子里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剪辫，他反对；我要上夜校，他又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三更半夜地在外边跑，不象话！’那时，我不过十六、七岁，但个子高大，他还说：‘你站起来跟教员一样高，不怕人家笑话！’我死活要去，他没办法，就让我跟他学。就这样，我从父亲那里学认了几百个字。

“这时，家里已经在背后商量要给我找婆家。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桌上摆着酒肉点心，点心包上有红纸的礼品签。我心里一惊，就问母亲是怎么回事？她先还吞吞吐吐，我问急

了，她才眼泪花花地对我说：‘孩子，你年纪不小了，作爹娘的不能留你一辈子啊！’我一听可真急了！革命已经给我指出了一条过去作梦也想不到的新路，如今爹妈又要把我往那老路上推，我哪能不急？在村里，人们一向夸我懂事、听话，这一回我可顾不得大人伤心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哪里也不去，谁也作不了我的主！媒人一上门，我就把他轰走！’父亲吓唬我，说要把我捆起来，我就喊着要上妇女会告他的状。这件事暂时搁了下来。

“这一两年里，世事发生了多少变化啊！一九二七年春夏，搞得非常红火的农民协会忽然消沉下来，有的人把梭镖偷偷丢到池塘里，到秋天，局面又有了转变，井冈山上成立了一支红军，我们这一带又红火起来。青天白日旗撕下来了，镰刀斧头的红旗到处飘扬，梭镖比早前磨得更亮，红缨枪的穗子红得耀眼，上千人的赤卫队组织起来，沿赣江站岗放哨，提防反对派的兵船开来，土豪劣绅们吓得跑的跑，躲的躲。

“这年冬天，我们村里有了共青团组织，公开吸收团员。在这之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共青团办的训练班，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团员，有些放心不下。有天傍晚，我放过哨，梭镖还没放下，就扯着我生父家的一个姐姐，去找共青团的负责人。那同志笑着对我说：‘你不是桂秀吗？已经有人把你的名字报上来了！’我说：‘那就好！我姐姐也想参加，行不行？’……就这样，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共青团。”

康大姐神情严肃地说了下去：

“当时，反动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后来我才晓得，我们那一块红色根据地和整个白区比较起来，真是九牛一毛哩！那时，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地方白军又在反扑了，谁谁被砍头了，什么地方血洗了村子……形势越来越险恶。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

这一带，反动势力也开始疯狂反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都分头隐蔽起来。父亲和二叔都是党员，我是团员，也都暂时离开了村子。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听到动静，她们就让我藏进柴禾堆。在这些日子里，我听到许许多多闻所未闻的事，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残酷的现实，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有多少好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也有人在生死关头动摇变节，也有人从此消沉下来，再不过问身外之事。这时候，我倒并不怎么害怕了，心想：人总是要死的，为革命死了也值得，总比让人当棵烂白菜踩一辈子强！有一天，有位同志悄悄来看我，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了！我擦着眼泪，说什么也不肯在外婆家呆了，要豁出去跟敌人拼！我说：人家那么负责的同志都牺牲了，我有什么不可以豁出来的？那位同志说了好一番道理，才把我劝住。

“老在外边躲着也不是办法，加上我到底年纪还小，不是敌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形势稍一缓和，我就回家了。这期间，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活动得十分嚣张，他们组织起什么‘靖卫团’，把个村子搞得乌烟瘴气！那些反动家伙一见到我们就瞪眼，常常不干不净地骂些下流话，我们年轻气盛，也忍不住，就狠狠地回他们几句。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们做的事光明正大，最大的牺牲是死，死都不怕，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不久，我父亲也偷偷回来了，总在外边也不行，一家人还得吃饭啊！时局动荡，家里对我更不放心，便加紧为我准备嫁妆，整天关着门叫我在家里捻麻线、做鞋子，打算选个日子，把我一轿抬走。这时候，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一天就象一年那样难熬！我跟在母亲身后吵闹，不肯做那些东西。母亲赌气说：‘你不做，到时候让你穿蓑衣上轿！’我说：‘看吧，也许有人上轿，没人下轿！’她听了又生气，又担心，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说开

来，说她白疼了我一场，如今翅膀硬了，不服爹娘管了！还说这样一件终身大事，一点禁忌没有，怎么专拣不好听的讲……她越说我越烦，心里更加怀念前一段火爆爆的开心日子。我多盼望革命快快回来啊！

“我曾偷偷去找过去的那些女伴们，想从她们那里拿点主意。可是，她们的遭遇跟我差不多，都想要往外跑。现在四处风声这么紧，谁知道革命队伍在哪里？我们这些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几趟的姑娘，出了村子就两眼漆黑，能跑得出去么？唉，看来面前真是绝路一条了！有人甚至想要当尼姑去。我说，要我成天守着那么个木头菩萨叩头烧香，我可不干，要是跑不出去，我宁死也不嫁人！

“几乎到了绝望的时候，有一位过去就在我们这一带活动的同志偷偷回来了。乱时，党派他到白军里当兵，如今回来，想必是有原因的。有天夜里，我摸黑去找他。一见面我就问他，我现在就去当女兵行不行？他说：‘现在还不行。’我向他说了我的处境，泪流满面地表示：‘如果家里逼我出嫁，我就只有一死！’他笑着说：‘死了就不能革命啦！’我说：‘出嫁了也不能革命呀！’他说：‘出嫁了还是能革命的。’随后又说，‘当然，婚事能拖就拖，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想法让你走！’接着他向我谈了外边的形势，嘱咐我和村里的人多接触，帮助组织了解情况。我的心顿时又亮了，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人一定会回来。每天总要想上几遍：也许他们今天就会来吧？如果红军走赣州过就好了！要是坐轮船走赣江，就一定要经过我们这里，我一定老远就招呼他们停船。要是他们听不清我的话，我应该怎样比手势，才能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呢？他们一定会同意我去当女兵的，那我就跟天上的大雁一样，张开翅膀，跟他们远走高飞，哪怕飞到天涯海角！

“就这样拖到秋天，一天傍晚，我正在杂屋里收拾东西，听到父亲在隔壁房间和谁叽叽咕咕说话，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说什么明天就要来了，要准备迎接。我心里一动，正想侧耳细听，恰好父亲探出头来，见我愣在那里，便说：‘上外面看看去，有人没有？’好久以来，我没象今天这样顺顺从从地听话了，就连忙跑了出去。只见沿江路上静悄悄的，天已昏黑，归林的老鸦哇哇叫着从头顶飞过，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转回来向父亲摆摆手，他忙向屋里打了个招呼，影影绰绰闪出个人来，匆匆从小路走了。等那人一走，父亲叫我关上大门，我回头就问他：‘这个人是谁？你们说谁要来？’父亲瞪了我一眼：‘不关你的事，不要打听！’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变得机灵起来，故意放开嗓子说：‘嗨，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不跟我说我出去跟别人说去！’父亲急了，压低嗓音骂道：‘鬼妹子！明天红军就要来了，你嚷吧，不等红军到，人家就先叫你的脑壳落地！’说完，他就匆匆走出门去。我听说红军明天要来，高兴得跳了起来！这些日子憋在心里的闷气，都象挤在喉咙里要冲出来似的，真想跑出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姐妹们。也真恨不得马上冲那班反动家伙哼他几声，但又怕走漏了风声闯祸，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天一黑就躺倒床上盼天亮。脑子里乱哄哄的，什么都想到了。我们这里，虽说早就闹起了革命，但还从来没见过红军。开始听人说到朱、毛，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红军的两位领袖。到底红军是什么样子？他们收不收女兵？他们肯要我这个没文化的乡里妹子吗？……心里整整翻腾了一夜。

“一大清早，父亲就出门忙他的去了。临走时嘱咐母亲，要她在红军进村后，把我藏起来。我也不吭声，干活时故意磨磨蹭蹭，母亲在灶屋里忙着做饭，我尽量躲着她，不跟她照面。趁她不注意，我就悄悄跑到街上打听消息。刚出屋就听到一片喊声：‘来

啦，来啦！’我灵机一动，三步两步来到鸡笼旁边，抽开板子，把一笼鸡都轰了出来往大路上赶，一边故意朝灶屋里喊：‘妈妈，鸡都跑啦！’妈妈慌慌张张地跟了出来，帮我把鸡赶回。我们刚进院，红军已经进了村子。忙乱中，妈妈把我推到别人的家里，恰好这屋子有个窗洞朝着村里的大路，我高兴地趴在窗口上，看了一整天过红军。只见集上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老百姓挤在大路两边和红军打招呼，就象招待出远门回来的亲人。红军人人穿着草鞋，衣服虽然破旧，但队伍整齐，人也精神，说话那么和气，连老百姓的大门都不进，当天就退到十里以外的地方驻扎。

“这天晚上，二叔来我家，兴头十足地谈起这一天的见闻，他那神气好象和红军有几十年的老交情咧！二叔参加了共产党，也当过村里的赤卫军，跟土豪劣绅斗争，他一向都很积极。这几个月，他也是东躲西藏，我不止一次地听他在我父亲面前说过，他没家没室，无牵无挂，这么躲躲藏藏，不如拿枪杆子干痛快！今天听他说得这么带劲，我心里转了个主意：如果二叔能先走，有了门路我就好跟上去。我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二叔，你不是早就想当红军吗，现在的机会可是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呀！’他点了点头没吭声。我又说：‘要去今晚就去，明天红军开走，又不知等到哪一天啦！’他似乎同意了我的看法，当晚就找红军去了。

“第二天，红军又进了村子，我说什么也不肯蹲在家里了，借口说要去找二叔，溜烟跑出了门。大路上，到处是红军，我东找西找也没找到二叔，又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心事跟生人说，只是站在一边听红军和村里人说话。这时，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桂秀，你们怎么还不出来给红军准备粮食呀？’我四处看了半天，才发现说话的人就在红军队伍里，是我们一个乡里的人，不知他什么时候已经参加红军啦！见到熟人，我的胆子就壮了，

兴奋地跑上去和他说话。我说：‘原来你也当了红军，我早先还真不知道红军是些什么人哩！’他说：‘什么人，还不都是自己人。赶快去给我们整粮食吧！’这下我就忙开了，到处串连积极分子，领着红军把‘挨户团’团长家里的猪赶出来，打开地主的仓库，和群众一起搬运谷子，舂米，烧饭……村子里人来人往，有说有笑，孩子们也一群群跟在人堆里凑热闹。三天以后，红军向井冈山开拔。我是铁了心要跟红军走啦！这次，参加红军的人很多，光我们这一带就有好几百，连我在内有七个女的。

“到了队伍里，才知道这次带队的是陈毅同志。他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带着一营人下山来专门扩充红军的。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和陈毅同志谈起这段往事时，他还开我的玩笑说：‘那回要不是我把你领出来，谁知道你现在是哪家的媳妇啊！’”

说到这里，康大姐爽朗地笑了。接着，她谈起了参加红军、离开家乡奔赴井冈山的情景，谈起了井冈山的生活——冬天，米饭冻在搪瓷缸里，嚼起来怎样咯崩咯崩响；浑身冻裂的口子，坐下怎样疼得站不起身；夏天，怎样打着雨伞“站”在露天地“宿”营；反“围剿”时，怎样搞群众宣传、慰问部队、打扫战场……这对于从小就过惯了苦日子、一心投奔革命的康大姐来说，连艰苦本身她都觉得是乐事呢，脸上整天挂着笑，好象什么都使她高兴。

我憋不住提了个问题：

“康大姐，您和朱德同志相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吧？”

康大姐点点头：

“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是在参加红军向井冈山进军的路。那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说：‘朱军长来了！’我心里一动：朱军长，那不就是传说中的朱、毛里边的一位吗？人们说得可神哩，现在有机会亲眼看看当然高兴。我挤到人群中，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体格魁梧、满

脸胡子的中年人朝我们走来。他脚上穿着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也是走了长路的样子。他在路边坐下，笑嘻嘻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反动派的军队，慢说一个军长，就是挨户团的杂牌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多少护兵保镖，我们红军的军长却象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官架子没有，对士兵和和气气，真没见过。听说他和战士们一块下山担粮食，大家称他‘伙夫头’。我刚从乡下出来，见着生人还不大好意思，但朱德同志平易近人，在他面前，并不感到拘束。后来我和他能组成家庭，也就是志同道合吧！当然，在许多方面，应该说我是他的学生。”

我说：“康大姐，听说您曾指挥队伍打过仗，我们很想知道您这方面的情况呢！”于是，她谈起一九三二年，江西瑞金曾经成立过一支二百人左右的女子义勇队。成员大都是来自江西、福建一带的农村妇女。其中不少是革命战士家属，她们一个比一个坚强、勇敢。康大姐担任这支义勇队的队长。训练结束后，有的分配到地方武装组织中担任队长、参谋，有的分到了后方医院。不久，康大姐又上干校（红军学校）进一步受军事、政治训练。她成天和男同志们一起打野外、筑工事、上操出勤。由于她身材高大结实，人们都说她赛过棒小伙子。康大姐谈了她第一次指挥战斗的经历。那是一九三四年，军委派她到赣州一带的游击队检查工事，并了解武装情况。有天晚上，她刚到达目的地，就遇上游击队和敌人开火。原来敌人是挨户团，晚上从江那边过来，上岸就放火烧了不少民房，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游击队同志气愤不过，当下就接火了。游击队领导人见康大姐是军委派来的，一定要她来指挥这场战斗。康大姐刚来，人地两生，又是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但情况紧急，不允许她片刻犹豫。她当即请游击队的同志介绍情况，接着又上山了解地形，做出战斗部署，直到

这一仗胜利结束，她才离开。

长征开始了，康大姐同红军战士们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路上，她时常帮身体弱的同志背负重物，身上有时背着三四支步枪，过草地时，红军分成两路，康大姐这一路因为在半途受涨水的黄河所阻，被迫回头，在西藏度过了冬天。那靠生麦、青草和树皮充饥的艰难日子，康大姐以她坚强的革命意志熬了过来。

康大姐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她就在中央妇委和全国妇联工作，解放后曾历任第四、五届全国妇联主席。

康克清 简历

康克清，一九一二年生，江西省万安县人。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

历任乡妇女协会秘书，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直属队指导员，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总支书记、主任，中央妇委委员，全国妇联部长、常委、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据《中国百科年鉴(1983)》〉